

生命實踐與自我認同：以服務工作及售貨 從業青年生涯適應行為為焦點的探究

林繼偉 黃小芬 邱春蘭 蔣琳琳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學系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索生涯適應行為在生命實踐與自我認同上的意義本質。研究者採取「現象學方法」，同時以「生命歷程取向」作為分析的架構，探討基層從業青年的生涯適應行為。首先針對目標對象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其次，依據「分層判斷取樣」自職業標準分類系統第五大類—「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中抽取九種職業類別並邀訪各類從業成員進行「半結構式非標準化訪談」。兩階段參與對象合計 14 人。跨歷程分析發現，研究對象從探索期的生涯不確定或無定向感，通過生命歷程的多重轉換尋求獨立自主，其中「出脫意識」扮演關鍵性的動力。華人文化社會的脈絡下觀察到鮮明的「搏拼與韌性」生涯行為；「吃苦與本分」的工作倫理；人情與人和的服務內涵；回饋與互動的成就認同；家庭中心以及幸福人生的生命實踐型態。研究對象的生命認同多處可見「有情」的本質，他們的生命圖像是力行與自我依賴。因此，本文將「自立」、「有情」、與「人生幸福」並列，歸納為華人部分群體—服務工作人員與售貨員的生命認同主軸。華人職業選擇與生涯發展超越「個人中心」式的自我選擇，更多倚賴「情境中心」人際互動。個人如何在依存關係平衡自我認同需求，應是生涯諮商需要細緻處理的課題。

關鍵詞：生命實踐、自我認同、生涯適應行為、生涯諮商、本土心理學

* 本文曾口頭與書面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第七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際研討會」(2004/10)。

壹、緒論

傳統諮商心理學中的生涯課題偏向生涯阻隔因素的介入，或特質因素 (trait and factor) 的處遇模式。而生涯適應行爲，包括自發與自助 (self-initiative and self-help) 行爲較少受系統性研究與應用。自 1990 年代以來，「建構論」 (constructivism) 成爲社會科學的主要派典，對生涯諮商與生涯教育亦產生顯著影響。依據建構理論，個體的生涯發展是以達成自我實現或「自在自如」 (well-being of self) 爲導向，而核心的生涯建構則多數指向成功成就、自我肯定、自我價值、人生意義等 (吳芝儀，2000)。Savickas (1993, 1997) 主張以生涯適應 (career adaptability) 的概念取代生涯成熟 (career maturity)，強調催化個體的整體發展，並引導當事人建立與其生活架構與生命主題符合的職業選擇。Savickas 呼應 Vondracek 和 Kawasaki (1995) 的發展脈絡論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建議未來的生涯研究應結合自我概念、脈絡性與多元文化觀點的，檢視生涯適應的作用與歷程。據此，本土心理學關切華人社會的生涯行爲課題自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而生涯適應行爲、生涯阻隔因素與其介入、以及特質因素處遇模式的探究應屬於相互參照的生涯課題面向，均亟待華人本土性研究的開展與進深。本研究試圖以本土心理學的觀察進路，針對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庶民階層，探究華人生涯適應歷程中建構性的自我認同與生命實踐主題，作爲理解華人生涯發展與自我實現的基礎。

一、台灣地區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台灣地區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屬於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 (行政院主計處，1992) 第五大類。主要包括嚮導人員、廚師、警察、監獄管理員、保全人員、隨車服務人員、商店售貨員、攤販及市場售貨員、餐飲、美髮及美容工作人員等。此類人員在四種等級的技術專業程度上屬第二級，較次於專業人員及技術員或助理專業人員。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占就業者之比重爲 18.94%，在九大職業類別中居首位 (行政院經建會，2003)，代表廣大範圍的基層群眾。針

對此類別的職業特性，有學者認為「服務」具有無形性（服務是無形的，消費者常藉由其他表徵來判斷服務品質）、變異性（同一種服務會隨著消費者、服務人員以及服務提供時間與地點的不同而有差異）、不可分割性（服務工作中，生產與消費往往同時發生且無法分割）、易逝性（服務是無法儲存的，因此服務提供者對服務的規劃與成本的控制成爲掌握服務品質的關鍵）（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5）。由上述說明可知，服務業是以客戶爲導向，以「人」爲中心，與其他職業別以「產品」（product）爲中心，有所不同。作爲台灣社會積極有爲成員的一部分，台灣地區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的生涯適應行爲展現開創進取的生命力，以其位居社會極普遍基層的性質，提供不可欠缺的民生服務。然而相較於在學青年，甚至其他職業類別的社會青年，他們的生涯行爲與歷程迄今未獲系統性的研究。

二、生涯發展與生涯適應

生涯（career）一詞最早見於莊子養生篇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在中國傳統詩詞中則以「生計」一詞出現，例如白居易詩中的「生計拋來詩是業」；劉滄的詩：「自憐生計事悠悠」，都含有生活之計的意涵。生涯的現代意義、範圍及內涵較傳統的定義更爲廣泛，其涵蓋範圍擴及個人一生。學者金樹人（1997）指出，英文中的“career”若以中文詞彙「志向」或「志業」翻譯，將更貼切。西方的概念，career 一詞原意如同在馬場上馳騁競技，隱含有未知、冒險、犯難的精神。學者們指爲：個人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一系列事態與工作，其範圍涵蓋個人的一生（Gysbers & Moore, 1981; Sear, 1982; Super, 1990）。綜上所述，生涯依據原意分析，可謂道路方向，意指一生有軌跡可循的謀生之路；也可解釋爲個人一生工作志業中，所應走的道路或生活方式。

生涯發展是生命全程的課題，Super（1985, 1990）的生涯發展階段理論堪稱是最具影響力的生涯發展理論體系。Super 以年齡的階段分析發展過程，將生涯劃分成五個主要階段，依序爲成長、探索、建立、維持、衰退五個階段。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分屬於探索階段與建立階段。其中探索階段發展的重點爲職業

偏好的具體化、多重職業選擇、面對工作的壓力或挫折；另在建立期的發展重點為安定、檢討、婚姻選擇、養兒育女，統整、穩固並力求上進和升遷。Super 認為生涯發展的過程，主要是發展和完成自我概念。因此，自我認同與自我價值觀的實現，可透過對職業的認知、試探、選擇、適應、發展而更加趨於成熟，達到自我實現的理想。

Dix 和 Savickas (1995) 將生涯適應行為 (career adaptive behaviors) 視為因應生涯變遷 (career transition) 與轉換任務 (change tasks) 的有效行動。生涯適應行為的內容包括生涯決策、問題解決與自我管理 (自發與自我導向行為)。Eggerweien、Krieschok、Ulven 和 Prosser (2002) 呼應 Dix 和 Savickas (1995) 的主張，建議未來研究應著眼於適應行為在生涯變遷歷程中的表現，而非僅限於現階段的作為。以變遷歷程觀點來看，生涯適應是指個人因應職場的環境壓力與挫折衝突等個人心理壓力 (黃中天, 1995)，藉由行動實踐達成問題解決與生涯目標的過程。鄭金謀和邱紹一 (2001) 更具體將生涯適應之歷程分成三個階段，初期為入門階段，即「初出茅廬，虛心求教」，中期為穩定接觸階段，即「顧及現實，穩實安命」，後期為彼此接納階段，即「心犀點通，理念包容」。鄭邱二氏的生涯適應階段論是極具華人本土意涵的理論，揭示華人生涯歷程的倫理性，同時呈現生涯發展的社會建構內緣。華人文化中濃厚的「合和」意向與「現實感」於此頂針突出 (孫隆基, 1986)，兼備中國人「寬容」、「忍耐」、「安定」等性格 (余德慧, 1990)。

三、生命實踐與自我認同

在生涯發展與適應的歷程裡，自我認同是從「混淆」到「認同」(identity) 的過程。Marcia (引自金樹人, 2001) 將「自我認同」分為四個層次，以危機為經，以定向為緯，分別為 (一) 迷失方向：處於危機狀態，對於未來沒有任何承諾 (二) 他主定向：已確定未來的方向，但是仍缺乏定見，也尚未跨過危機 (三) 尋求方向：已脫離危機，但對未來還沒有定向 (四) 自主定向：跨過危機，對於未來以身相許。承上述，自主定向是最高層次的自我認同，尋求自

我清楚的定位。余德慧（1995）闡述在東方觀點的 *identity* 是指「不會改變的東西」或「一直同樣的東西」。應用在個人身上，就是指個體具有某種堅毅的力量，保持個人統整的風格。那是一種不猶豫的決斷之心，也就是把某些根本性的目標建造到「生命」裡頭，亦即「本命」。

劉淑慧（2000）從華人先哲的論述來描述生涯觀，認為生涯除了「營生」的方向與方法，還涉及「生命觀點」，可細分為「存在本質」與「關照角度」。前者是人對存在本質的看法，反映出人與環境、人與人的關係本質，以及人在此情境中謀求生存的基本策略，也是反映出終極生命意義之所由來。後者是看待生命歷程之方法，反映在審視生涯歷程之焦點及評估生涯滿意度之原則。

此生命觀點的生涯觀更將西方職業選擇的自我認同提高到終極的存在本質、生命歷程的視距。誠如高柏園（2002）所言，生命是在時間中展開，呈現多重活動與歷程。當個人主體加以自覺思考、反省，即為生命之實踐。故生涯歷程可視為生命實踐的場域。馮朝霖（1997）進一步說明「自我生成」即是「生命實踐」，在生命實踐過程中有四個不斷交織出現的意向活動，為「自我評價」、「自我期許」、「自我組織」、「自我超越」。「自我評價」時間向度是「過去」，其意向特徵是人向自己說「是什麼」的程度；「自我期許」時間向度是「未來」，其意向特徵是人向自己說「要什麼」；「自我組織」時間向度是「現在」，其意向特徵是「什麼是有意義及有興致的」；而在「自我超越」中，時間向度是三時向，過去、現在、未來，其意向特徵是「割捨」與「聯結」。

綜言之，生涯是個人在工作志業中所踐履的方向道路。個體在生涯歷程中學習適應，並逐漸探索與澄清自我定位，尋求自我認同，最終達成自我實現、生命實踐之目標。反過來說，生命實踐的全程亦是一個完成自我認同任務的過程，且投射在整體生涯適應行為。

四、生命實踐與認同的本土研究思考

華人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是為了更真切及全面地理解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楊中芳，1991）。楊中芳（2001）提出本土研究的進路，其要略為觀察當地人

當下的活動及行為現象並提出研究問題，使用日常生活中慣用的概念來發展研究構念，同時在文化社會脈絡中形成釋義系統與模式，進而透過實徵研究建立本土心理知識體系。就現階段而言，關注進行其中任一項目的研究均為有意義的本土心理學研究。參照上述的研究進路並結合 Runyan 所指「經驗的歷程會隨著文化、歷史階段甚至個體差異而有相當多的種類與變化」的觀點（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等譯，1982/2002，頁 129），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中的「現象學方法」合併「生命歷程取向」的研究方式，探討台灣地區社會青年生涯適應行為。採用生命歷程的概念，從本地日常生活的現象取材（實際的生涯行為）。研究者也秉持開放的立場探究其中蘊含的本土熟悉的概念，並在文化社會脈絡下進行釋義。

賴誠斌和丁興祥（2002）比較 McAdams（1988, 1990）與沈從文對生命認同發展主軸的劃分，指出西方人的親密（intimacy）與權力（power）和中國知識份子的「有情」與「事功」乍看之下頗為相似。賴誠斌和丁興祥由此發出一連串頗有意義的詢問：兩者之間概念的差異為何？有情與事功在中國文化下呈現怎樣的生生命圖像？或者是否中國的生命認同發展根本不是有情與事功所能定義的？賴誠斌和丁興祥主張研究中國文化下傑出人物的生命歷程，甚至集中在特定社會歷史時空的群體人物的研究，廓清歷史與文化脈絡下個人的生命發展型態及核心關懷。上述藉由生命歷程的研究，檢視有情與事功作為自我認同主軸的適當性（legitimacy）或存在其他認同的可能，誠然是極具啟發性的。對特定社會歷史時空的一群人的研究方式也擴大了研究的途徑，「歷史或各人的經驗也許就在這不斷地重述、再現的歷程中獲得意義及啟迪」（賴誠斌、丁興祥，2002，頁 208）。

在研究的對象的選擇上，賴丁二氏似乎是較為偏向「傑出人物」，或者二者尚未對所謂的「一群人」作更清楚的界定。傑出人物取向的研究將聲譽卓著或特立獨行的人物視為一個時代的指標，從他們對周圍社會環境的獨特適應圖譜出當代社會文化內涵。然而在研究一個文化群體（通常為國家或族群）時，Lin

（林語堂）特別指出不可忽視「普通人」（郝志東、沈益洪譯，1935/2002）。這些「平凡人物」作為一個集體，卻潛在地共同影響社會文化的形塑，也因此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林語堂（郝志東、沈益洪譯，1935/2002，頁 15）生動地陳述：

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觀察中國的唯一方法，也是觀察任何一個外國的方法，亦即考察普通人的而不是異乎尋常人的道德價值，…通過考察婦女奇裝異服遮蓋下的真正婦女特徵與母親氣質，通過觀察男孩子的調皮與女孩子浪漫的白日夢。…只有從男人們的憂傷與女人們的哭泣中，我們才能真正認識一個國家。

呼應賴誠斌和丁興祥（2002）研究特定群體的主張，本研究以台灣地區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為研究對象，同時以「平凡人物」類型為研究主體。這樣的嘗試或許更能圖譜華人文化脈絡下社會特定群體的生命實踐與自我認同真實樣貌，建立一個與其他文化社會脈絡的華人群體會通的基礎。

五、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嘗試以本土心理學的關懷角度，透過華人家庭脈絡與文化背景，探討基層人員生涯適應行為與其意義本質。依據 Super（1985, 1990）的觀點思考此一問題，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和個人發展（personal development）既是密不可分，且以自我概念為共通核心動力，那麼，生涯發展歷程中將會呈現何種個體積極的生涯適應行為？其次，研究者試圖從基層人員奮發有為的生涯行為中探究其內在動力與方向，認識其生命圖像，即自我認同與生命實踐。因此，本研究將有助於在傳統上以士大夫為基礎劃分的「有情」與「事功」概念之外（賴誠斌、丁興祥，2002），擴增對於庶民之互為主體的理解與認同。依據上述研究目的，研究者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台灣地區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的面對生涯發展任務以何種多元化的行為因應？不同的生涯階段呈現何種生涯適應行為？
- （二）個體在時間縱軸（longitudinal）上長期的努力將實現何種自我認同與生

命實踐的內涵？

爲回答上述問題，研究者試圖集合數例個人生涯敘說，做跨案例分析而獲致共同主題與意義結構，同時保存部份特則。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研究對象的經驗世界，呈現生涯適應行爲（經驗）的意義結構與核心主題（essential themes），探索生涯發展在生命實踐與自我認同上的意義本質。研究者採取質性研究中的「現象學方法」進行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與現象學分析（高淑清，2003）。人如何從意識到語言陳述生活世界，現象學提出從「知覺」到「理解」的實質運作過程的方法論。第一步是持續知覺，以存而不論的開放態度涉入，注視顯現的多重樣態。第二步是聚焦「部份」，將部份帶到注意的中心，由整體爲背景而凸顯此部份爲前景。第三步是將部份與整體的「關係」勾畫出來。最後，範疇直觀的理解判斷，以語言陳述此範疇對象（李維倫譯，1999/2004）。訪談結果依循「整體—部分—整體」三角循環程序，分析台灣地區服務性工作人員及售貨員生涯適應行爲。研究者同時採互動論的觀點，以「生命歷程取向」的研究方式（丁興祥等人譯，1982/2002）考量生涯適應行爲「個人×行爲×情境」的互動關係，作爲現象學分析的背景架構。進而從華人家庭與文化脈絡，討論生涯適應行內涵思與其意義。

二、研究參與者

依據「分層判斷取樣」（stratified judgmental sampling）的原則，自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系統第五大類—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中抽取九種職業類別。受訪對象之職業類別包括廚師、餐飲服務人員、理燙髮工作人員、美容工作人員、殮葬人員、保全人員、商店售貨人員、攤販、市場售貨員。其次，以研究問題爲基礎選取可以代表各類總體的個別成員合計九人爲個別深度訪談對象

(參見表一)。其中含男性四人，女性五人。年齡分布為 20 至 35 歲之社會青年。教育程度均為高中職學歷。審酌區域分布平衡，訪談對象中四位來自東部、三位北部、兩位中南部。此外，在正式個別訪談前，研究者邀請六位（實際與談五人。男性三人，女性二人）第五大類從業人員進行迷你焦點團體訪談（潘淑滿，2003）。第一階段之焦點團體訪談與第二階段之個別深度訪談參與對象總計 14 人。所選擇訪談對象均為典型性（typical）或一般性（common）代表，而非所屬職業類別中顯著特出人士。

表一

個別訪談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代名	性別	年齡	學歷	職業別	入行 年資	先前工作經驗
1	小堂	女	30	高職	餐飲服務生(A)	1年	數個，多為店員或餐飲服務生
2	誠一	男	35	高中	銷售人員(B)	10年	店員、送貨員、業務員
3	正平	男	30	高職	攤販(C)	2年	娛樂業服務生、店員
4	麗絲	女	26	高職	美髮(D)	9年	同現職
5	如玉	女	22	高職	美容(E)	4年	美髮
6	安家	男	28	商專	保全(F)	2年	電腦業
7	小傅	男	32	高職	廚師(G)	4年	加油站員工、中華汽車、日本料理、海產店、美崙飯店
8	永寧	女	24	高職	殯葬業(H)	3年	史前博物館工人、殯葬業
9	衣珊	女	34	高職	服飾業(I)	13年	會計、擺地攤

三、研究工具

歸納焦點團體訪談結果，並配合文獻探討，擬定半結構化訪談大綱。本訪談大綱的目的，在於引導受訪者開放性地敘說個人生涯發展歷程與經驗。訪談綱要如下：

1. 你現在的工作內容？做些什麼？需要具備的特質和能力？
2. 當初接觸此行業的機緣？
3. 爲了這份工作，當初做了什麼準備？
4. 工作上遇過什麼挫折或爲難的地方？或印象深刻的事件？自己如何來面對這些？
5. 有沒有看到同業／老闆值得效法的地方？你如何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6. 生活和工作中最讓你感到快樂的是什麼？成就感爲何？
7. 努力的動力是什麼？
8. 你曾經做過哪些方面的工作？
9. 你的家人都做些什麼樣的工作？家人對你的工作選擇有何看法？
10. 如果爲下一階段作預備，你計畫做什麼？會如何去做？
11. 你覺得做到什麼地步，自己是成功了？
12. 這幾年的歷練，你看見自己成長了什麼？改變了什麼？你會如何來形容自己目前或一路走來的生活？

四、實施程序

本研究首先針對服務工作及售貨從業青年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獲取研究主題的實際資料，並配合文獻探討，擬定半結構化訪談大綱。其後以九位該職業類別青年爲對象，進行個別深度訪談。

(一) 焦點團體訪談

研究者採取焦點團體訪談進行研究主題之探索，企圖透過團體互動過程收集廣泛而多元的資料，從中篩選並形成正式訪談時的主題或綱要。焦點團體在本研究中被定位爲探索性前測（胡幼慧，1996），研究者從中對未來研究對象的口語表達方式與內容建立初步認識，俾於掌握適當的訪談技巧。同時也有助於降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因背景或生活習慣的潛在差異所形成的相互距離感（Krueget, 1994；引自潘淑滿，2003）。爲求較爲深入的團體互動並獲取豐富多

元資訊，研究者運用「迷你焦點團體」法（潘淑滿，2003）。迷你團體成員一般約為四至六人。本次焦點團體訪談邀請六位參與者，實際出席人數為五人。團體訪談由研究主持人領導團體討論，全程兩小時，協同研究者於團體中進行錄音與筆記。

（二）個別深度訪談

研究者自可能的訪談對象中依照分層判斷取樣方法，排定訪談優先名單。訪談員依序徵詢同意，並於確定訪談對象後澄清訪談性質與主題，其後於約定時間進行面談。為符合現象學方法的開放性與立即性，訪談方式採取「半結構式非標準化訪談」(semistructured nonstandardized interview) (鄭瑞隆，2003)。即以事前設定的訪談綱要為藍本，根據受訪者敘說內容或流向 (narrative flow) 彈性調整提問順序。同時在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前提下，訪談員可以即席自主延伸訪談，不完全受訪談大綱的限制。訪談時間平均為兩小時，依實際情況略有增減。本次研究訪談員為三位修習過社會科學方法學與質性研究之諮商輔導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先前曾受訪談訓練且實際參與現象學方法研究。訪談員獲得訪談對象同意後予以錄音。

（三）資料處理

最終之現象學分析文本合計九份，來自與九位個別訪談對象之會談紀錄。訪談內容經錄音處理後轉謄為逐字稿，並郵寄函覆受訪者徵求確認或補充。研究者針對語意不明、相關事實模糊或相互牴觸內容，以電話或面談方式對部分受訪者實施事後訪談。研究者綜合經確認後的逐字稿與事後訪談記錄成為生命歷程與現象學分析的訪談文本。本研究中的生命歷程分析係以生涯發展階段標定生涯適應行為，區辨不同發展階段的行為主題，且在特定主題上依據當事人不同「狀態」進行討論。現象學分析的具體步驟則參考 Creswell (1997) 與高淑清 (2003) 所提出的分析方法與程序，將文本中的意義單元分類為個別主題，重新組織並發現共同主題，最後予以統整並陳述現象的本質。

研究者與三位研究訪談員反覆閱讀文本，產生對研究對象主體經驗整體的理解，再共同參與文本分析，標記、註解重要的陳述，達共識後決定個別的意義單元。至此，再次閱讀文本，反覆省視總體意義與個別意義，藉由群聚相關的意義單元產生共同主題。最後，透過想像的變異（imaginative variation），尋找所有可能的意義與不同觀點，最終發現構成此經驗的本質，融合四位研究者觀點完整如實且整合性地（compositely）描述受訪者的生活世界。

上述現象學分析方法符合 Duckes（1984）提出現象學研究效度（verification）。Duckes 認為效度需包含不同研究者或讀者對研究結果具相同的確認（confirmation），且是透過研究者自發性認知的理性分析（rational analysis of spontaneous recognition），而此研究結果也能類推到相似的經驗中。文本分析中的反覆省視過程，亦符合 Moustakas（1994）所強調研究者對此經驗意義的反思，建立與受訪者的「互為主體的效度」（intersubjective validity）。

本研究文本呈現（引述）之編碼方式以職業別（A~I）起首，其次為性別（男性為 1；女性為 2），最後為訪談逐字稿中之頁碼，例如：A-2-10 即職業別為餐飲服務人員的女性受訪者在逐字稿第 10 頁之談話記錄，餘此類推。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生涯適應歷程分析

（一）探索期

生涯適應歷程中，個人面對生涯發展初期階段的探索任務，資料分析後發現四個代表性的主題：「認同危機」、「因緣際會」、「蟄伏意識」、以及「多元社會學習經驗」。

1. 認同危機：問題標籤

依據受訪者自述，他們在青少年階段多半無法從學業尋求自我認同，進而轉向對課業以外事物的關注。美髮師麗絲（下文均略職稱）喜愛交友尋樂，正

平爲了女友而中輟學業。他們自認經歷了一段好玩叛逆的生活，也經常承受他人給予的問題標籤，同時以負向的看法—「滿叛逆的」、「混」等標籤自己。即使如此，他們在自我認同上仍有基本分際，就如誠一自述「我們跟朋友在一起就是這樣子跟人家學壞…，但壞也沒壞到哪裡去，只是感覺不是像我哥哥像我姐那麼乖的學生。」(B-1-24) 受訪者陳述走出校園時的徬徨：誠一自述所學非個人興趣，且缺乏專業自信，因而感到前途茫然；小傅述說服兵役前的一段工作經歷：「找不到工作，…回來花蓮，做一般的加油員啊，什麼有的沒有的。」(G-1-1) 危機意識促發了受訪者不斷嘗試轉換。另一個缺乏正向自我認同的現象可能來自就讀科系與職業選擇的差距上，除美髮、美容等職業類科外，其他受訪者描述就業轉業的歷程，共通的一句話是「不能學以致用」，這也使他們在初入職場時需要從學徒起家或無師自通地摸索。

2. 因緣際會

多數受訪者基於因緣際會接觸目前工作。從訪談者的求職經驗中，發現除職業學校畢業受訪者外，誠一、正平、安家及小傅皆因熟識友人引薦而入行，相較於接受正規教育者循序漸進的生涯規劃與謀職有所不同。當事人在面臨生涯抉擇之際，透過親人朋友引薦而初步接觸，也在自身對某種行業不排斥的情況下，生涯有了另一種展現的可能。安家在退伍後適逢熟人從事保全業，也就順勢的接下這份工作；小傅經歷許多工作的轉換，開始憂鬱何去何從之時，恰巧透過家人介紹，認識日本料理廚師。當下也勾起受訪者從小對料理的興致，因此開始了廚師的學徒生涯。因緣際會的現象一方面衍生自認同危機，另一方面反映出講求「關係」的華人文化脈絡。

3. 蟄伏意識

多數受訪者從低薪或學徒等基層工作起家，展現沈潛、蟄伏的個人動力。正平描述起先無力負擔黃昏市場的租金，只好從「叮仔腳（騎樓）」(台語) 擺攤起，到今天「市場第一名」；「勤學與受教」是此時他們共同看重的生涯適應

行爲。小傅說明中餐的學習過程需要「排菜、沾板、冷盤、燒臘、爐頭」(G-1-13) 過關斬將。學作日本料理時：「五十音一個禮拜就要會了，橫的直的都要會。第二個禮拜開始背日文菜名。唸給師父聽，一個月之內差不多就會了。」(G-1-2) 麗絲等在學徒階段，放低姿態、虛心求教，以獲取師傅傳授的意願；小傅提及當時「你也很努力，人家看得起你，就把你提拔，比方你這個阿弟仔很認真，每天這麼勤勞在做，久而久之，師傅看你這麼勤勞，他就教你些功夫。」(G-1-2) 面對生命中的許多挫折與困境，他們能隱忍、屈就於當下的處境。正平形容在打拚的過程：「什麼工我都可以做下去啦，打工一個月賺個幾千塊也是不錯。」(C-1-18) 此動力顯示受訪者強烈的成就動機，冀望掙得個人發揮的空間。

4. 多元的社會學習經驗

傳統知識份子與現代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信念：「知識就是力量」。從受訪者中發現更貼切的描述是「經驗就是力量」，即獲取的知識多半來自經驗的累積。如玉自信心地陳述「就是靠那一段美容師的實務經驗，我才有現在」(E-2-7)。此經驗式學習於青少年求學階段已見雛形，如玉、麗絲、小堂等皆陳述校外工讀經驗的學習。在學即有豐富工讀經驗的正平，描述在速食店「學到就是人家經營方式」(C-1-18)。當事人於生涯建立階段仍不斷在職場 (field) 主動尋求各方學習的機會，再轉化成爲自己的專業知識，如：麗絲以觀察學習的方式吸收資深美髮設計師的技術；如玉模仿其他店長的經營之道或主動向上司求教；永寧詢問耆老學習各地的殮葬風俗禮儀；正平利用工作閒暇之時觀摩、探求他人的經營秘訣。

經驗學習亦表現在受訪者「做中學」及「嘗試錯誤」上，如：如玉、麗絲、小傅專業能力的精進，是透過不斷的嘗試學習，從錯誤中力求改進；正平、永寧、衣珊在與顧客互動中學習經營管理方法、待客之道。一路上，受訪者靠強烈的動機，在「學徒生涯」或「社會學習」上都表現勤勉的學習態度，集結各多元的經驗，形塑自我的成功之道。

綜言之，服務工作及售貨從業青年從校園步入職場是生命中一個重大的轉

換，首要衝擊是來自認同危機、他人的質疑，以及面臨自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他們在蟄伏的基層階段，透過多元的社會學習經驗開創出路，尋求自我認同。

（二）建立期：草創與穩固階段

初步確定創（就）業方向後，個體進入職涯建立階段。創業初期的草創與穩固（trial and stabilization）階段，研究者分別就「關係取向的經營策略」、「貴人與運命」、「競爭」、「韌性」四項具代表性的主題分析如下：

1. 關係取向的經營策略

中國文化的基礎是趨於尋求和諧，強調人情世故中的和諧與平衡（吳樹德，1991），黃懿慧（2002）稱之為關係中心取向。訪談中不難發現受訪者普遍看重人際網絡的建立，尤其重視「人情」與「人和」。強調待客之禮的如玉表示「服務態度沒有放低、沒有很好的話，這樣子沒有辦法就業」（E-2-2）；而身處競爭激烈環境的小堂也提到「以客為尊」的經營理念。黃光國（1988）指出作為社會交易資源的人情，不僅可能包含具體的財貨與服務，同時還包含抽象的情感。和客戶的互動往來多以藉此關係或人情獲得其他目標的手段或工具，稱之「工具性關係」。特別是自行創業的受訪者基於永續經營的目標，對於如何掌握顧客的心理、留住主顧自有其獨到的方法。如正平在擺攤之初「喜歡和客人開玩笑、喜歡關心客人」（C-1-9）等，就客戶個人層面的事務做些許的問候與探詢，讓客人覺得窩心，獲得「花一樣的錢，我覺得跟你買比較快樂」（C-1-9）的感受。衣珊則是強調讓客人「最習慣找你」（I-2-7），因為「你知道我要什麼」（I-2-7）。至此商品已是其次，服務人員與客戶更重視的是互信互惠的「均等法則」與「人情法則」。

除客戶關係的經營外，職場上和同事或同業之間的和諧也備受重視。對華人而言，維持團體內部的和諧與團結似乎比強調公平分配更為重要（黃光國，1988）。誠如身為店長的如玉提到「帶人要帶心」（E-2-4），贏取向心力；正平提到「我沒有起過爭執啊」（C-1-13），表現出華人在人倫社會次序的層次上強調「異中求和」與「尚不爭」等特性（黃麗莉，1996）。上述訪談引述，再再道出華人

在職場上「和為貴」的人際理念，重視禮尚往來、相互讓步。

2. 貴人與運命

事業成功與否與職場中是否有「貴人」相助，以及能否掌握「運氣」，也是大部分受訪者所重視的議題。文崇一（1988）指出華人的行為既有高度的關係取向與其敏感性，「有沒有關係」通常成為要不要幫忙或協助的關鍵。因此若能在職場中與上司或同事建立良好關係，則前途必然有相當益處（即所謂的貴人相助）。這些「貴人」可能是入行時的職場導師，例如麗絲提到自己身為學徒時，總有一兩位設計師會幫助他；如玉提到上司和她「算是良師益友」（E-2-8），這位美容師也以成為下屬們的良師益友自許，形成良性循環。

若失意於職場，受訪對象常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自然失敗亦有其命定）。這種相當程度的認命觀點深刻影響華人的人生觀與行為（文崇一，1988）。例如形容自己為千里馬的誠一慨歎沒有遇到伯樂；小傅在爭取不到理想的職位時，發出這樣的感嘆：「看你有沒有遇到貴人提拔你啊！…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運。…抓不住，什麼都沒有。」（G-1-14）。上述言談中交織著「貴人」與「運、命」的意識，這似乎是小傅知覺到不可掌控的外在因素，卻深深影響當事人創（就）業的前景，且成為生涯發展的解釋系統。從天命解釋成敗固然可能限制個人的開創力與社會進步，卻也能減少焦慮與挫折感（文崇一，1988）。

3. 競爭

在生涯建立期的草創階段，同業間的競爭常是激烈且必然的。初次擺攤的正平形容同業間使用各種手段（罵三字經、削價競爭等）（C-1-3）來排除異己；麗絲曾被同事當眾指責；小堂被新進同事打小報告等等。面對同業（事）間的競爭，衣珊強調以打電話、傳簡訊的方式主動出擊；誠一提到面對競爭時，更重要的是去「思考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B-1-3）。他甚至以人情層面的服務，如陪客戶打球、修電腦等來加強客戶關係。受訪對象嘗試以獨特與創新的服務

從同業中脫穎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前強調競爭求勝的文化當中，受訪者卻呈現一種共存共榮的厚道精神。誠如麗絲所說「做人要厚道一點是對的，你要給自己留後路，也給別人留一條後路」(D-2-6)，因此，她絕不去搶佔客戶；正平和一位曾經千方百計想趕他走的同業從互不相容到「我去幫她拼」、「她有時候幫我佔車位」(C-1-11)。這種化敵為友、共存共榮的經歷，展現華人在職場上獨特的競爭倫理。

4. 韌性

訪談文本隨處可見受訪者在生涯歷程中韌性的展現，尤其是面對挫折時，不難發現多位受訪者發揮所謂「打斷手骨顛倒勇」(台語)的精神。例如誠一在面對不留情面的難堪時，從當下「我那麼卑賤幹什麼」(C-1-27)的挫敗感中，轉換到「我一直去突破，總有一天感動他」(C-1-27)這種唾面自乾的精神。生意一度蕭條的正平表示「我想要再突破」(C-1-10)，於是以各種方式虛心求教，並且邊學邊做；面對收到假鈔、客人偷菜或謊稱付錢等生意虧損時，仍然樂觀積極，持續地檢討改進。小傅自述十八歲時在汽車公司可以領四萬多元的高薪，卻轉行當只有四分之一薪資的學徒，他以能屈能伸的態度說：「我不覺得我丟臉」(G-1-18)。面對姊姊和同儕的詢問與嘲笑，他決定「重新開始走出自己的一片天」(G-1-19)。綜上所述，不難發現這些受訪者在艱困環境下過人的抗壓性、適應力及持續力，正是他們搏拚時自恃的韌性。

(三) 建立期：提昇階段

在事業逐漸穩定後，進入提升(advancement)與轉型的階段，分別以「獨立自主」、「守成」以及「不易與變易」三個概念來加以探討。

1. 獨立自主(靠自己)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從業青年在訪談文本呈現鮮明的自立(self-reliance)形像，多數人白手起家，沒有既成的生涯階梯可以依恃，也缺乏社經地位的優

勢資源或父母指引 (parental guidance)。職涯初期或以低薪的學徒身分學藝 (廚師小傅、美容師如玉、美髮師麗絲)，或無師自通自行摸索 (市場攤販正平、服飾業者衣珊、銷售人員誠一)，或如餐飲服務人員小堂在低技術性的職業多次更迭。他們的生命圖像是自力更生、凡事「靠自己」的一群人。正平的一段經歷很寫實地道描繪出胼手胝足的生命力：

「不知道要去哪裡租房子，找不到，就到處找。後來那個房東說：我明天才有空喔。我在外面睡了一天，在那邊等了一天。第二天他來喔，我一大早就在那邊等他。同時還有五個人要租房子，他說：等一下還有誰，等一下幾點還有誰。我告訴他希望你能租給我，我昨天被蚊子叮了很久，我沒地方睡覺，剛來台北而已，我希望有一個地方能夠睡覺。結果感動那個房東，他本來想要租給女孩子，最後還是租給我。」 (C-1-21)

衣珊的批貨故事呈現出靠自己時的「嘗試錯誤」過程：「我跑去和攤販批貨，賣了一個月後，就覺得賣衣服利潤那麼少，我轉賣給客人，客人就會跟我殺價，其實利潤就很少。公司裡面就有一些男生業務說：妳幹嘛去跟攤販拿，你去那個五分埔！…」 (I-2-21)，她用「赤手空拳」 (I-2-21) 總結自己這一段歷程。

尋求獨立自主、獨當一面的決心與毅力延伸至生涯提升期，例如衣珊及麗絲走過從前的擺攤、學徒生涯，如今已能「獨當一面」；小堂盼望不再受雇於人，勤學餐飲技能為將來開店做準備；小傅表示「要自己去當老闆」 (G-1-21)，顯示從受雇到自主、受限到獨立的渴望。受到獨立自主動機的驅策，這些青年多半敏銳於景氣的觀測，並經常抱持轉換跑道及開創新局的準備。例如：正平著手進行市場調查以及產品開發的工作；安家也在工作閒暇積極參與基層特考，準備進入規模較大的紙漿公司就業等等。儘管如此，也有部分受訪者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中，因獨立自主的動機受挫顯得甚為無奈。

2. 守成：穩定平順

部分受訪者秉持守成的心態，他們的價值觀從過去的衝刺擴張，轉為穩定

平順的追求。例如過去汲汲營營想賺錢的衣珊，現在「過得去就可以了」(I-2-11)；而誠一在十年努力奮鬥之後表示：「過去的人生打拼階段我覺得都過去了」(B-1-21)，因此「只希望我未來的歲月平穩」(B-1-20)。年齡似乎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如衣珊表示「現在三十幾歲以後，那個體力有差，你就不會想要那麼拼了」(I-2-10)，平穩安定的追求中，以健康的身體為優先考量。

此外，多數已婚的受訪者追求穩定的生活，目的是希望帶給家人快樂與滿足。如誠一表示「我養家活口讓我的家裡快樂，…只是這樣而已。」(B-1-33)；衣珊提到「目前只是想說三間店穩定，多一點的時間陪小孩子這樣就好了。」(I-2-5)；由此可見事業動力的改變常取決於生涯發展階段，當事人的態度多轉向平淡無爭。

3. 不易與變易：從傳統到現代

受訪對象意識到需要發展獨特且不易被淘汰的生存條件，具備專業的證照是其中一例。多數受訪者因應國家的制度，考取該領域的專業證照。例如，如玉除了國家證照之外還獲得公司 C 級美容師的考核；正平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爭取合法的生存權。從上述行為看見受訪對象為自我提升、符合體制、維持現代化形象所做的努力。

此外，營業的方式與項目不斷的推陳出新，這是受訪者視為在變遷社會中的生存法則。其中較明顯的例子如永寧為極力擺脫傳統葬儀社給人流氓般的負面印象，決心以現代化的經營方式來建立新形象，除將靈車從傳統改為西式外，店面及服裝的整頓與專業化也是改革的重點之一；而小傅則是強調走出廚房學習人際溝通，「把自己當成一個行銷的產品」(G-1-19)。顯然在現代的社會中「墨守成規」已成了生涯發展的危機之一，然而如何在「變與不變」之間權衡得失來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則是他們持續不斷學習的目標。

二、文化社會脈絡中的自我認同

依據上述生涯適應行為歷程分析與生命實踐，研究者探討跨歷程的自我認

同主題，還原個體生命實踐中的自我認同本質。舉出「出脫意識」、「面子與口碑」、「吃苦與本分」以及「回饋與互動」四項內涵。

（一）出脫意識（出人頭地）

訪談結果中發現，成長於某些弱勢或不利因素，包括家貧、低學歷等背景的服務業從業人員普遍具有強烈的「出脫（台語音 chut thuat）」意識。就業初期基層的社會工作經驗更強化此種出人頭地的志願。相對地，缺乏上述背景的少數受訪者則較無明顯的出脫意識。儘管如此，弱勢背景、不利因素與卑微的職涯初期經驗仍構成服務業從業人員的主要生活圖像，因此出脫意識也成爲一個顯著的代表性特徵。正平敘述離鄉背井到台北謀生，在市場邊緣設攤的經驗，一段「我站在路邊喊了三個月，太陽底下，那時候八月一號正熱的時候，很多人看了…她說你不要再喊了，我跟你買就是了」（C-1-36），道盡初期的艱難。他表示自己的目標就是出人頭地，「聽林強那個歌嘛：來去台北打拼」（C-1-16），對照林強《向前行》歌詞：「阮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講啥物好空的攏在那。朋友笑我是愛做暝夢的憨子，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一句「啥物好空的攏在那」恰正反映出脫意識底下的「好景嚮往」。衣珊爲了減輕父母的負擔不斷自我鼓勵，表示自己「會有一種上進的那種心啊！」（I-2-4），原始的動力依舊是改善家庭的經濟。

還原此種出脫意識的本質後發現，受訪者的生涯目標並非特殊遠大的抱負，出人頭地也不意味尋求出類拔萃。反而正如「出脫」的原本意涵：脫貧或脫困，其實是一個平凡的願望。表現在受訪者生涯歷程中的則是銷售從業人員加倍努力，企圖在學歷較高的同事當中脫穎而出；麗絲、小堂準備自行創業，脫離寄人籬下的受雇環境；以及小傅在飯店受限於發展機會，盼望轉作外場卻感受重重限制的無奈心境等。出脫意識衍生自若干弱勢與不利因素，成爲貫穿多數服務工作及售貨從業青年職涯的核心動力與自我認同的基礎。而當事人對自身當下生涯情境或成就的評鑑，亦即是否出脫有成的自我衡量，則是工作滿意度與自尊的關鍵因素。

(二) 面子與口碑

自我認同不僅建構在個人層次，也形成於社會層次（賴城斌、丁興祥，2002）。「面子與口碑」是另一個可以從訪談文本辨識到的突出主題。面子的在生涯歷程中的主要作用之一在於決定進退取捨。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受訪者一面對開會對人潑水、拍桌子或辱罵的上司忍耐八年而不轉業的原因，據受訪者解釋：「我自己的面子問題。因為我一換工作，…那邊 MBA 啊什麼一大堆。所以我如果一跳槽，我會從基層做起，這方面我就有點不大願意。」(B-1-9)，後來轉換跑道的理由也如出一轍，「轉來這邊做業務副理，重新開始又有一個一定的職位，我是覺得蠻能夠接受的」(B-1-10)。從上述陳述中發現，面子問題實質上可能超越權力薪資等實際因素。

業績傑出的正平很傳神地形容自己的表現「沒有給大家丟臉，算是做得也不錯啦！」(C-1-14)。上述言談的背景卻是位居市場同業第一名，隱約透露當事人「不負眾望」的面子關注才是自我評價的加權因素。而其中隱藏的信念在同一次訪談的對話中清楚顯露：「我不想人家看不起我」(C-1-14)。被看得起或看不起對於成長於弱勢或不利背景的當事人而言自然具有切身意義。上述「要面子，怕丟臉」的自我認同心態是坐落在關係密切的社會網絡（家庭、同儕、親族、甚至社區關係）之上。同儕間的面子問題有如：「辦完同學會後，是我請客的啊！…變成是說我在同學的心目中是一個在社會發展蠻有成就的。」(B-1-15)；家庭中的面子問題則有如：「從小就被奶奶啊、被爸爸很輕視的那種感覺，所以你就會很努力吧！你就會不想讓他看扁」(I-2-14)。親族與社區（鄰里）中的面子問題或許可以從受訪攤販被問到是否曾想放棄而返鄉的回答看見：「不會，因為我覺得回家很丟臉」(C-1-24)。

相近於面子的另一概念——「口碑」則在生涯行為中扮演當事人生涯自我管理的積極性角色。永寧為了樹立好口碑，提及：「不要像說有一些人聽到葬儀的時候就好像是流氓的感覺，所以說目標就是注重家屬服務的品質。」(H-2-6)；麗絲以自身的感受服務客戶，同時也因客戶遠道而來「我想來讓妳剪」(D-2-5)的好評

而自豪感動。面子與口碑是生涯適應行為的情緒性心理動力，於提升自我、平衡情緒（特別是面對低潮與挫折時）具有催化作用。

（三）自我肯定：吃苦與本分

儘管面子與口碑足以使當事人自豪，然而此類建立在社會層次的認同似乎仍不及個人層次的自我認同。多數受訪者在陳述早年工作情況或評價成功時的語句，反映當事人自我認同的基本價值：吃苦（或作努力）與本分。小傅透露自己背後的努力：「現在年輕人不會像我們以前這樣了，很多人不能體會我們以前吃的苦」（G-1-18）。吃苦在他的眼中成爲一個區辨（特定）人我的指標。誠一說道：「我現在感覺不是很成功，但是我不後悔，因為我努力過，我盡我的能力了。…那個美好的仗我自己知道就好。」（B-1-14），靠著努力而得到的自我肯定平衡當前不盡如人意的作品。其他包括如玉自述盡力而爲，「做到問心無愧」（E-2-9）、安家強調盡責工作、以及麗絲多次在訪談中以「做好本分，不要和別人多計較」（D-2-14）自勉等均可以看到盡本分在自我認同中的倫理性價值。吃苦與本分的信念源自傳統社會家庭教育。台灣俗諺：「吃苦當做吃補」，或如楊中芳（2001，頁77）所言：中國社會對人的要求「講義務、重自愛、自制、自律」。吃苦與本分的傳統教訓無疑已轉換成爲自我認同的行為基礎。

（四）成就動機與成就感：家庭回饋與互動

搏拚的經驗和生涯目標投射出何種心路歷程？在訪談文本中我們觀察到職涯早期的事業企圖心和旺盛的衝刺力。然而一種沉穩深刻的動力卻逐漸浮現。此種成就動機呼應人情與人和的經營原則，最終收斂在「回饋」信念上。永寧表示：「要讓父母覺得沒有牽掛，所以在事業上面就逼自己要有一個很好的成就。」（H-2-31）；誠一的一段話更顯示回饋動機的家庭關懷性質：「如果我四十歲的時候賺了一筆錢，在我父母親越來越老的時候，能夠盡量陪在他們的身邊。」（B-1-24）；麗絲表示學習美髮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可以幫媽媽做頭髮，其中均隱含濃厚的孝道精神。類似回饋家庭（包含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的語句在多位

受訪者的言談中反覆出現。此種出於家庭關懷的回饋動機似乎是華人生涯目標的一大特徵，推測也是華人文化社會中跨職業類別的共同心理動力。

另一值得記述的是，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從業青年的工作成就感除了物質報酬、專業口碑與發展榮景等普遍性的價值外，亦建構在與客戶的互動上。正平很自豪地說：「現在我的客人也很死忠，…我沒有去他們會等我。」(C-1-8)，這樣的成就感是由相互忠誠的關係所獲致。永寧也說：「我們常常都是做得很好然後成為好朋友的，…其實這就是比較有成就感、比較快樂的。」(H-2-13)。上列引述或許反映「搏感情」或「交心」的願望，這應是華人「重人情，講關係」的又一應用，或許亦可視為跨越「工具性關係」而至具有延續性與一定程度情感的「混合性關係」(黃光國，1988)。

綜合而言，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從業青年的自我認同基本上是建構在個人層次的出脫意識，近似個體心理學家阿德勒「從自卑到超越」的概念。然而本土的出脫用語更蘊涵文化社會脈絡意義，反映社經地位的落差和父母期望，甚至背負家族興衰的使命感。出脫意識至此已經呈現濃厚的社會建構意義。面子與口碑則是可以直接從社會互動中交換的訊息，它是個人生涯適應行為的情緒動力和他尊的基礎，衍生自密切卻界線模糊的人際關係網絡。就價值層面分析，吃苦與本分淵源自傳統社會文化，藉由素樸的家庭教育印記在自我認同概念。個人生涯的自我認同最終回歸到成就動機與成就感，我們發現家庭回饋與互動似乎是華人最具特色的成就動機，而超越客戶服務層次的人際互動狀態成為服務工作及售貨從業青年的認同重要來源。

三、文化社會脈絡中的生命實踐

生命歷程中的生涯適應行為集成「家庭思維與幸福人生」、「俗民信念與俗民智慧」、「搏拚與得失」、「困境與超脫」四項生命實踐內涵，他們共同呈現生涯適應行為的意識性動力與目標。

（一）家庭思維與幸福人生

家庭的影響從訪談資料中很鮮明地突顯，「家庭思維」貫穿在受訪者的搏拚歷程中。首先是「為」這個家庭扛起責任的思維（家享，for the family）在清寒環境中成為他們初始搏拚的動力，如：身為長女的衣珊因家境的關係表示：「心疼媽媽的辛苦，所以勤奮工作是理所當然的。」（I-2-12）；成家立業後的小傅、安家等，都表示妻兒的生活成了他們繼續打拚的動力。其次，除了「為家庭、扛責任」的思維外，也有「受」家庭觀念影響的思維（家治，by the family）。在生涯路徑抉擇時，誠一與衣珊都選擇父母認為好的職業，放棄了自己原本的興趣；在生涯挫折時，小堂提到「父母叫你要忍耐」（A-2-34），而選擇無奈地繼續忍受；在轉換工作之際，誠一因「父母認為換來換去換不到好工作」（B-1-9）而繼續留職。因此，個人的生涯歷程，不只是個人目標、意志的表現，家庭思維也在其中運作，承擔家庭責任或承受家庭信念與意志的家庭意識（家有，of the family），牽引當事人的生涯發展。受訪者之未來人生幸福的遠景與家庭思維緊緊相扣。離鄉背井到外地打拚的正平和誠一嚮往家鄉平靜安穩的生活；衣珊、安家期待與親人相處的親情；麗絲及永寧尋求工作的平順。

全文呈現生命的歷程中不斷轉換的搏拚，走向平靜安穩的家庭生活。吻合余德慧（1995，頁58）指出「傳統的中國人認為從一個置身到另一個置身，是『漂泊』的浮萍生命，我們不自覺地崇尚『根』部，以為『有根乃大』。這種想法其實是從『繁衍子孫』『安基立業』的格局著眼。所謂的大並不是個人生命的『大』，而是『家業』『家族』的『大』，是『蔭擇後代』的『大』。」

（二）俗民信念與俗民智慧

上述的家庭思維，是個人生涯全程的底層影響因素。然而除家庭思維，個人自身又秉持何種信念，得以展現生涯早期搏拚、屈就的精神？在訪談中，我們歸納三點主要信念：「不服輸」、「趁年輕」、「一步一腳印」。多處可見當事人以「不服輸」的口吻來陳述搏拚的歷程，衣珊在擔任會計領微薄薪資看見專

櫃小姐的高薪，油然而生「他一個月可以領這麼多，為什麼我不行」(I-2-18)。此外，如玉敘說自己當年打拼時，因為「趁年輕」(E-2-1)的信念，可以無所畏懼。其中的素樸的信念是年輕代表衝勁及機會。而生涯發展全程所持的信念是「一步一腳印」，麗絲、小傅多能鄙事，殷勤誠懇地從學徒階段安步晉升。引誠一貼切的形容，在生涯不確定時期是「走一步看一步」(B-1-21)，如今我們卻從受訪文本中看見當事者「一步一腳印」的奮鬥歷程。

除「不服輸」、「趁年輕」、「一步一腳印」的信念外，經驗所累積粹練出的個人「智慧」亦不容忽視，此種「智慧」是人情人和的智慧，顯現在待人接物上重關係的交陪（台語）。例如：正平表示「禮多人不怪」(C-1-31)、「多一個敵人不如多一個朋友」(C-1-22)的生存之道，願意「為五塊錢講三次謝謝」(C-1-8)、與競爭激烈的同業主動示好協助，轉變成共容的友伴關係；如玉對部屬講求「帶人要帶心」(E-2-4)，她會主動關心員工近況。使得他們在「識人」的智慧上十分敏銳，善於察言觀色，如：誠一在與客戶第一接觸時，便能「像心電感應這樣，那一個一定不會買我的帳，越來越會判斷」(B-1-28)；安家對來訪客人能「看一個人第一眼覺得有危險性，你就要小心」(F-1-7)。

(三) 搏拼與得失

Adler (1963) 指出大凡個體皆有獨特的追求卓越的目標，它賦予個人生活的意義，同時建立在生命格調 (life style) 之中。從前文中，可以看到處於弱勢家庭或不利因素的當事人，基於承擔家庭責任的目標，或秉持不服輸的信念，而形成出人頭地的目標，他們生活格調所展現的是一「搏拼」，內容包括額外付出、比別人加倍的努力、窮盡自己的時間和心力以及任勞任怨等。誠一 (藥品) 描述到「要想一些別人沒有辦法做，我可以做的服務，…去醫生家修電腦，…，醫生喜歡運動我可以陪他去打球」(B-1-3)；當時白天做會計晚上擺地攤的衣珊說：「晚上別人在睡覺，我還在工作，…，幾乎全年無休」(I-2-22)；小傅回憶當時學徒階段：「別人十點才上班，我八點一到就要去了，…有的沒的要先做」(G-1-17)；正平需每天清晨兩點至批發市場與同業競標價格，再靠自己搬載貨品至銷售處。

然而這樣的搏拚，卻是以犧牲為代價，犧牲身體健康或與家人相處時間。曾經愛唱歌的正平為賣菜喊到「沒有辦法再唱歌了，…，聲音沙啞」(C-1-8)；衣珊有所感觸地提到這樣的忙碌，與孩子的互動減少，孩子曾對她說：「媽咪我有一個願望，…，我希望每天你能哄我睡覺」(I-2-9)，她聽了不禁要流淚。受訪者經常要面對搏拚與得失之間的平衡。這群處在基層的工作者呈現搏拚的精神，呼應黃文雄(2000)論述台灣人因歷史社會條件形成獨有的「打拚」(phah pian)之社會倫理，富於勤勞精神、開創性與戰鬥性的內涵。準此，「搏拚」代表著台灣住民獨特的核心人格(core personality)，是生涯適應行為的意識性動力與展現。

(四) 困境與超越

生命實踐其一的意向活動為「超越」(馮朝霖, 1997)。自何種環境超越？如何超越？可從訪談者描述挫折困境及因應一窺。在講究人情與人和的職場中，其困境也來自於「人」—客人、家人、同事與上司及自身。誠一拜訪客戶時被毫不留情面地回應，客戶用「你找我幹嘛，…，我需要你幹什麼！」(B-1-27)，讓他覺得難堪受辱；殯葬業者永寧隨CALL隨到的服務，仍受客戶的批評責罵；衣珊賺了七萬塊，興高采烈地回家分享，卻遭到父親一副懷疑地說「是做一些不好的工作吧！」(I-2-13)；麗絲描述同事「說話都是冷嘲熱諷，給妳刮(台語音，ㄅㄛ)。」(D-2-6)；小堂也無奈表示到「完全不欣賞你的店長，一直在扯你後腿。」(A-2-21)。在自身的困境中，主要集中在低學歷以及缺乏專業自信，誠一及小堂都表示學歷低，除了現有的技能，也沒有其他市場競爭力，即使想轉業也動彈不得。

處於此困境，卻要兼顧人情與人和，他們磨練出「忍」、「認」、「轉化」的思維。麗絲表示「妳要得到別人的東西，沒那麼簡單！要不然妳就是一直忍耐；妳得到了，就是妳的」(D-2-7)；誠一以成就感來轉化：「挫折同時也有人給你鼓勵阿，…，所以這個得分跟失分中間，一個平均之後就覺得，你就可以接受了。」(B-1-27)；如玉以學習來轉化：「ㄟ那也是一種學習。」(E-2-12)。在上述這三

種思維似老莊的思想—「放」的生存哲學，在本質上是以心境的轉換來超脫現實的得失（劉淑慧，1990）。

綜言之，此四項生命實踐內涵，與馮朝霖（1997）提出自我生成自我過程中，「自我評價」、「自我期許」、「自我組織」、「自我超越」四個意向活動相關。「家庭思維與人生幸福」成爲「自我期許」，期許自我爲家庭承擔責任，尋求平順安穩的家庭幸福。「俗民信念與俗民智慧」源自個人「自我評價」，在生涯不確定時期的自我評價中，生成不服輸、趁年輕、一步一腳印的信念，及重人情人和、懂得觀人的智慧。「搏拚與得失」即「自我組織」的動力與展現，爲現在覺得有意義與動機之事不計代價、窮盡心力。「困境與超越」勾勒「自我超越」的歷程，在多重困境中，藉「忍」、「認」、「轉化」向上提升。

四、生命實踐與自我認同之整合分析

（一）家庭影響

原生家庭在華人生涯「自我認同」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即使在二十一世紀「後現代」的今天，華人傳統的價值信念，例如「出人頭地」、「不辱門楣」等觀念，在九位受訪者的生命實踐思維中依舊相當明顯。而部分家庭的性別刻板印象與重男輕女等負面觀念反倒激發女性受訪者自立自強的鬥志。訪談對象的生涯選擇多處見到家庭「共同決定」（shared decision）或父母決定（parental decision）的斧鑿痕跡。

成家立業之後，婚姻家庭促使當事人重新思考個人的生涯發展課題，影響所及，受訪對象的工作表現似乎趨向兩極；其一是評估現有職場發揮空間有限，當事人因此加倍努力，積極尋求開創自己的新天地（如小傅、正平）；其二則是保守地尋求現況的滿足與穩定，事業的關注轉爲更多親情的關注（如誠一、衣珊）。此外，經濟上的考量雖然從原生家庭轉向婚姻家庭，回饋性的成就動機卻始終是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者的認同價值。

（二）先苦後甘的哲學

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以持續搏拚的精神追求人生幸福，多數在創（就）業歷程中崇尚勤勞的價值，強調「吃苦」的競爭力。再加上「蟄伏意識」的昇華作用，以及出脫意識的推波助瀾，受訪對象普遍對自我犧牲習以為常，付出身體健康與休閒娛樂的代價。他們常以「如果沒有當初的努力，就不會有今日的我」來肯定過往的努力與付出（正平、衣珊、如玉）。在人生階段與事業發展漸趨穩定之後，他們仍以其所堅信的「不要怕吃苦」、「趁年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研究者按：指事業上的衝刺]」等信念來勉勵後進。而且安於當下辛勞，抑制目前享受。在建立自我認同之餘、或初步達成脫貧脫困的目標之後，種種的努力似乎本於「儲蓄」(saving)的信念，寄望「延期償付」幸福於未來。據此，「先苦後甘哲學」大抵成為他們生命實踐的基本信念。

也正因為先苦後甘的哲學，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者在挫折因應上常「以忍為師」，「以認為綱」。然而，他們也在稍後時期發展「轉化」等較為成熟的適應機轉。華人的傳統教訓或俗民智慧「堅百忍而圖成」、「認命認份」等心理平衡方法也為先苦後甘的哲學提供內涵。

（三）生命歷程的多重經驗與轉換

多數受訪者在投入目前的職場前都有一段投石問路或頻繁的工作轉換的經驗。即使在生涯的穩定階段，半數受訪者仍然考慮轉變的可能，而且隱然以轉換的潛能自詡。此種生命歷程的多重經驗與轉換是華人普同的現象，抑或為部份群體所特有？研究者依據訪談文本的現象學分析，歸納若干關鍵現象與本質。受訪對象在生涯探索時期較不受「正規教育」的羈縻；因弱勢與不利等背景因素未獲系統性生涯引導；著重經驗學習甚於知識學習；一項負面自我認同：自評缺乏專業；以及一項積極自我認同：孔子所謂的「多能鄙事」。上述現象僅是初步分析結果，尚待進一步較大規模的檢驗。

生命歷程的多重經驗增強當事人面對變化的適應力與彈性，本研究中的從

業青年在問題解決上多呈現果決自信的風格。此外，尚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仍是以興趣為本，多數受訪者的職業選擇或就業（**employment**）卻不脫「因緣際會」（**chance encounters**）的性質。**Bandura**（1982）認為這是個人因素與社經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本文中發現可能牽涉的因素包括個人生涯未定向與初期缺乏就業競爭力等，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四）內外控並蓄的生涯觀

從建立期的草創與穩固階段，可以發現一組貌似矛盾而並存的華人文化的深層思維，即「靠自己」與「貴人與命運」。前者代表扭轉命運，操之在我的內控思維；後者代表聽天由命、操之在人的外控思維。此現象與楊中芳（2001）闡述中國人的「與外界妥協」的行為不謀而合，即「對中國人來說，『盡量努力嘗試掌握自己的命運』，亦即西方定義的內控，似乎與『認為世事並非人為因素所能完全決定』或『自己的命運非完全操縱在自己手中』等外控的想法，可以齊頭並存（楊中芳，2001，頁 80）。」因此，本研究結果支持，華人的控制觀應非如西方所言偏向外控性，而是內外控並蓄的。

肆、結論與建議

從上述結果與討論發現，台灣地區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從探索期的生涯不確定或無定向感，通過生命歷程的多重轉換與「經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追尋獨立自主的人生幸福。此過程中，「出脫意識」扮演關鍵性的動力。又基於服務工作與銷售業的基層屬性，甚至從業人員弱勢或不利背景，「蟄伏經驗」成爲一個富於特徵性的共同初期經驗。相關從業人員面對競爭而具風險的環境，開展出多元的適應行為與價值信念，我們從華人文化社會的脈絡下，觀察到鮮明的「搏拚與韌性」的生涯行為；「吃苦與本分」的執著信念，「家庭中心與幸福人生」的生命實踐型態；親情與關係取向的成就動機；家庭回饋與互動；以及從衝刺擴張，到以安定保守爲依歸的轉變歷程。

台灣地區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的生命認同多處可見「有情」的本質。具體的表現則是人情與人和的服務內涵、回饋與互動的成就認同。本研究發現一個有趣結果，依據黃光國（1988）對人際關係的分類，工作中與客戶的「混和性」關係，而不僅限於「工具性」關係常成為從業青年津津樂道的成就感來源。另一方面，「事功」對基層庶民而言的意義在於轉換困境、獨立自主與社會聲譽（即面子與口碑），應是與其原本意涵稍有距離了。

本研究結果亦支持林語堂對中國人生命認同的看法。林語堂透過詮釋中國人的人文主義，指出中國人的人生目的集中在「世俗的幸福」。「中國人明確的認為：人生的真諦在於享受淳樸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歡樂和社會諸關係的和睦。」（郝志東、沈益洪譯，1935/2002，頁94）。

最後，集合生涯適應行為可見，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努力尋求獨立自主，他們的生命圖像是力行與自我依賴。因此，研究者將「自立」、「有情」、與「人生幸福」並列，歸納為華人中的部分群體－服務工作人員與售貨員的生命認同主軸。

一、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的限制有二：

- (一)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式主要以「深度訪談」的個案敘說為主，建議未來研究能視研究問題，搭配參與觀察、傳記測量或問卷調查等其他資料收集方式，應能收穫其他層面的發現。
- (二)由於研究對象置於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研究結果尚無法類推或與其他類別會通比較，建議未來研究能擴及其他職業群體，逐步累積「部分」的內涵，以觀華人本土文化社會現象的全貌與內在的變異性。

二、諮商應用

本研究探討服務工作與售貨從業青年的生涯適應行為及自我認同與生命實踐的歷程，嘗試還原生涯內涵的有機整體性，並呈現生涯發展的多重狀態。生

涯諮商不僅是生涯規劃、壓力調適等處遇，更可以作為一個深入探究當事人生命實踐與生涯自我認同的過程。從研究結果推論並引用許烺光（1970/2001）心理社會圖的概念，華人職業選擇與生涯發展超越「個人中心」式的自我選擇，更多倚賴「情境中心」的生涯互動影響因素。其中的關鍵因素包括家庭思維以及蘊含在文化社會中的俗民信念。而個人如何在情境中心的依存關係平衡自我認同的需求，應是生涯諮商需要細緻處理的課題。

生涯適應行為既反映文化社會脈絡，同時也突顯個人主體性的認同，呼應諮商輔導的情境中，重視以當事人為中心的諮商關係。強調問題的澄清與介入策略應建立在對當事人整體脈絡和個體自主性的認識。期盼本研究部分結果可以協助諮商員提升對不同的生命實踐與自我認同內涵的敏銳度。

研究對象之早期生涯適應歷程顯示，他們在求學過程較無法自課業獲得自我認同，轉向社會經驗的學習，進而培養個人職涯的信念與韌性。其次因為與主流的生涯藍圖顯有距離或缺乏父母指引，當事人經常處於嘗試錯誤與多重轉換的歷程，亦使他們不免有發展不利（*underdeveloped*）的感嘆。研究者據此反思，建議生涯輔導工作與教學宜對學生課外的生活事態以及社會經驗提昇尊重和關注，並納入課程與教育活動中。生涯教育亦應秉持多元文化的價值觀，透過全面性職業世界（*world of work*）探索與不同類型的生涯楷模，建立弱勢青少年的積極認同與生涯成熟度。

針對本文之任何回應、回饋或意見，請直接聯繫：林繼偉，970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學系，e-mail:chiwei@mail.nhlue.edu.tw，(03)8227106 轉 2500



收件日期：2006 年 1 月 3 日
通過日期：2006 年 7 月 27 日

參考文獻

- 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等譯 (2002)。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台北市：遠流。Runyan, W. M. (1982). *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文崇一 (1988)。中國人的富貴與命運。載於文崇一、蕭新煌 (主編)，中國人：觀念與行爲 (25-42 頁)。台北市：巨流。
- 行政院主計處 (1992)。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台北市：行政院主計處。
- 行政院經建會 (2003)。台灣地區近 10 年職業別就業情勢分析。就業市場情勢月報，2003 (5)，19-25。
- 吳芝儀 (2000)。生涯輔導與諮商。嘉義市：濤石。
- 吳樹德 (1991)。人情問題與文化比較。載於余德慧 (主編)，中國人的心理 (112-119 頁)。台北市：桂冠。
- 李維倫譯 (2004)。現象學十四講。台北市：心靈工坊。Sokolowski, R. (1999).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 余德慧 (1990)。中國男人的生涯觀－戰將與黑卒。台北市：張老師。
- 余德慧 (1995)。觀山觀雲觀生死－生涯白皮書。台北市：張老師。
- 金樹人 (1997)。生涯諮商與輔導。台北市：東華。
- 金樹人 (2001)。「我」的看見與現身－「職業組合卡」的不可能任務。中華輔導學會 2001 諮商心裡與輔導專業學術研討會，台北市。
- 胡幼慧 (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市：巨流。
- 郝志東、沈益洪譯 (2002)。中國人。香港：三聯。Lin, Y. (1935).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 孫隆基 (1986)。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台北縣：古楓。
- 高柏園 (2002)。生命實踐的理論性與實踐性。載於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 (主編)，第一屆生命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3-18 頁)。台北市：萬卷樓圖書。
- 高淑清 (2003)。現象學方法及其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載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

- 所（主編），質的研究方法（93-134頁）。高雄市：麗文。
- 許烺光（1970/2001）。中國人與美國人。（徐隆德譯）。台北市：巨流。
- 馮朝霖（1997）。盡人間情性參天地化育一論 EQ 與生命實踐。哲學雜誌，19，33-37。
- 黃中天（1995）。生涯規劃概論—生涯與生活篇。台北市：桂冠。
- 黃文雄（2000）。台灣人的價值觀。台北市：前衛。
- 黃光國（1988）。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載於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權力遊戲（7-55頁）。台北市：巨流。
- 黃麗莉（1996）。中國人的和諧觀/衝突觀：和諧化辨證觀之研究取徑。本土心理學研究，5，47-71。
- 黃懿慧（2002）。「關係取向」理論模式初探：組織與利益關係人關係之探討。本土心理學研究，18，95-172。
- 楊中芳（1991）。試論中國人的自己—理論與研究方向。載於楊中芳、高尚仁（主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93-145頁）。台北市：遠流。
- 楊中芳（2001）。如何研究中國人：心理學研究本土化論文集。台北市：遠流。
- 劉淑慧（2000）。人生哲學—從華人先哲的論述看生涯觀。輔導季刊，36（2），1-11。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市：心理。
- 鄭金謀、邱紹一（2001）。全方位生涯規劃：建構多角化的人生藍圖。台北市：新文京。
- 鄭瑞隆（2003）。符號互動論及其在教育研究上之應用。載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質的研究方法（135-146頁）。高雄市：麗文文化。
- 賴城斌、丁興祥（2002）。歷史及社會文化脈絡中個人主體性之建構：以沈從文的堅持為例。應用心理研究，16，173-214。
- Adler, A. (1963).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Paterson, NJ: Littlefield, Adams.

- Bandura, A. (1982). The psychology of chance encounters and life path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7), 747-755.
- Creswell, J. W.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ix, J. E., & Savickas, M. L. (1995). Establishing a career: Developmental tasks and coping respons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7, 93-107.
- Dukes, S. (1984).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in the human science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23(3), 192-203.
- Ebberwein, C. A., Krieshok, T. S., Ulven, J. C., & Prosser, E. C. (2002). Voices in transition: Lessons on career adaptability.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2(4), 292-308.
- Gysbers, N. C., & Moore, E. J. (1981). *Improving guidance program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Krueget, R. A. (1994).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London: Sage.
- McAdams, D. P. (1988). *Power, intimacy, and the life story: Personological inquires into identity*. New York: Guilford.
- McAdams, D. P. (1990). Unity and purpose in human lives: The emergence of identity as a life story. In A. I. Rabin, R. A. Zucker, R. A. Emmons & S. Frank (Eds.), *Studying persons and lives* (pp. 148-200). New York: Springer.
- Moustakas, C. (1994).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 Berry L. L. (1985).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rketing*, 49, 41-50.
- Savickas, M. L. (1993). Career counseling in the postmodern era.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7, 205-215.
- Savickas, M. L. (1997). Career adaptability: An intergrative construct for life-span,

- life-space theory.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45, 247-259.
- Sears, S. (1982). A definition of career guidance terms: A national vocational guidance association perspectives. *Vocational Guidance Quarterly*, 31(2), 137-143.
- Super, D. E. (1985). *New dimensions in adult vocational and career counseling*. Occupational paper No. 106. Columbus, OH: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 Super, D. E. (1990).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In D. Brown & L. Brook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theories to practice* (pp. 197-26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Vondracek, F. W., & Kawasaki, T. (1995). Towar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adult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ntervention. In W. B. Walsh & S. H. Osipow (Eds.), *Handbook of vocational psychology* (2nd ed., pp. 111-141). Hillsdale, NJ: Erlbaum.



Life Praxis and Self Identity: A Study of Career Adaptive Behaviors of Young Service Workers and Salespersons

Chi-Wei Lin Hsiao-Fen Huang Chun-Lan Chiu Lin-Lin Jiang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e concept and meaning of career adaptive behaviors in the light of life praxis and self identity. A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was employed to explore grassroots employed young peo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life course orientation. A focus group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followed b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targeted participants- a total of fourteen service workers and salespersons. Cross-stag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nts attempted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from career indecision or lack of direction of the exploration stage, through multiple alterations of life courses, during which the “coming out” ideation had a propelling dynamic. From the aspect of Chinese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e authors observed vivid “ exertion and resiliency” career behaviors, “hardworking and dutiful” work ethics, “interpersonal-minded and harmonious” service contents, “feedback and reciprocal ” success identification, and “family-centered and life happiness” life praxis. The life pictures of the grassroots participants were action and independence. Thus, the present study placed self-reliance, affectionateness, and life happiness jointly as the life identification axis of the significant partial group of Chinese- service workers and salespersons. Their occupation selection and career exceeded person-centered self selection and leaned more toward to situation-centered interpersonal considerations. The issue of balancing various needs for self identity of a client in the attachment context should be more

thoroughly researched in career counseling.

Keywords: life praxis, self identity, career adaptive behaviors, career counseling, indigenous psychology.



